

论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及其指导意义*

■ 曹洪军

【提 要】整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也是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方法论。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不仅表现为对政德建设问题的全面论述，而且体现为运用整体性思维方法，对政德建设问题进行理论体系及实践问题的阐释建构。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对推动党的政德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政德建设观 整体性 价值论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20)05-0038-06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20.05.006

既高度重视全体公民道德建设，又特别注重强化官员政德建设，是习近平道德建设思想的鲜明特色。长期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涉及政德的概念内涵、政德建设的目标要求、价值意义、路径方法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系统的政德建设观。文章试图依据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系统梳理分析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及其价值意义，期望对推动党的政德建设之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贡献。

一、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整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也是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秉持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质，体现了运用整体性思

维解决政德建设问题的方法论要求。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科学内涵，对于把握习近平政德建设观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整体性”已成为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本属性和活的灵魂。虽然关于其内涵的理解尚未统一，但其中“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整体性方法论”是影响最大的两种观点。

学界较早从理论体系内容丰富、结构合理、逻辑严密的角度来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学科特点，但它们又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体，彼此从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不可分离。”^①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了完整、严密、整体的马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体系演进逻辑及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KS170）、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基础”课教学中“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JDSZK098）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体系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18SJZDI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指出：“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2]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严密性。

马克思强烈反对将其理论教条化、教义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世界观具有高度统一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还有另一个重要内涵——整体性方法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这里的“方法”指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始终秉持普遍联系和发展观点，从物质实践活动出发，在考察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采用辩证的方法，运用整体性思维“完整地描述事物”，强调整体“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4]。在马克思那里，“整体”是一个包含整体性思维方式等诸多要素的复合性概念，强调用整体性分析方法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这是一种力图用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的划时代变革的理论。”^[5]因此，运用整体性思维，从整体上系统分析和全面把握客观对象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整体性方法论是“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6]。

用整体性方法论解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这是因为，虽然整体性是理论科学性的重要表征，但整体性不等于科学性，过分追求理论的整体性，往往会走向科学性的反面。黑格尔把“整体性”发挥到了极致，但也由此窒息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这也是马克思生前强烈反对将其理论学说体系化、教条化、教义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来界定其整体性，还应该注意，这一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

运用整体性思维方法，在分析解决各种社会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正是因为坚持和继承了整体性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才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表征

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不仅表征为对政德内涵结构、建设目标、建设价值及建设方法的系统论述，更体现为始终运用整体性思维方法对各要素环节的阐释建构，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大德、公德与私德：政德内涵整体结构认识论

习近平不仅完整地提出了新“政德”概念，还创造性地率先提出了“大德”概念，强调了“大德”“公德”与“私德”的三维一体有机统一关系。

“政德”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一语，意指政事和德行。其后，《孔子家语》“政德贯乎心，藏乎志，形乎色，发乎声”与《七召》“政德洽於霜风，教义穷於足跡”中的“政德”分别指端正的德行与严明的风纪。《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语直接指明了“政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可见，古代“政德”即“为政之德”，主要指为政者处理公共事务应该秉持的道德操守，相当于现代社会官员的“职业道德”，属于“公德”范畴。古代没有明确区分“公德”与“私德”概念，但无论是早前的“察举制”还是后来的“科举制”，都强调对官员“孝、廉、公、慎、勤”等整体道德素质的考察。习近平承继、弘扬中国传统“政德”概念意蕴，将“官德”等同于“政德”，明确指出“官德”是一个历史范畴，与民德及一般的职业道德相比，具有特殊性、双重性和发展性，“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7]。

在现代社会，着眼于人的生活工作场域，以影响对象和范围为依据，将道德划分为“公德”与“私德”是通行做法。“私德”主要指个人品德，是个人在处理私人事务时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公德”则包括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体到“政德”领域，狭义“官德”指官员从政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与师德、医德相对应。广义“官德”包括官员的私德和公德。由于官员手中握有公共权力，“官员无私德”成为古今中外的主流共识，广义“官德”概念被广泛接受。习近平在谈及“官德”时，把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与其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合一而论，强调官员“私德”对普通民众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领导干部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其一言一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8]

习近平承继了中国传统“政德”概念意蕴，吸收了近现代政德划分的通行做法，将官员的个人品德及其家庭道德一起归结为“政德”中的“私德”，将官员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一起归结为“政德”中的“公德”。除此之外，针对中国共产党官员的特殊使命和政治要求，习近平又创造性地将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等视为官员应该拥有的“大德”，视其为党员干部的政治灵魂和精神之“钙”。在三维一体的“政德”概念中，“大德”是引领官员从政方向的指南针，“公德”是规制官员从政行为的准绳，“私德”是保障官员立身从政的根本。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关系。习近平强调官员必须兼具“三德”：“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其所。”^[9]

(二) 明大德、守公德与严私德：政德建设整体要求目标论

习近平新“政德”概念的确立，指明政德建设要同时发力并细化对官员“三德”的目标定位和具体要求，确保政德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第一，“明大德”是对官员思想政治层面的要求，是政德建设的首要目标。习近平多次从坚持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加强党性修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角度论述了“大德”建设的重要性。“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10]习近平明确要求官员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11]，要率先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2]总之，强化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做到“四个自信”、坚持“两个维护”，事关政德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价值指向。

第二，“守公德”是政德建设的核心目标。习近平将官德归结为“为民、务实、清廉”，认为“为民”是官德的核心、“务实”是官德的基础、“清廉”是官德的内在要求。^[13]“守公德”的目标指向是要强化和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官员是否真正做到恪尽职守、依法办事、公正廉洁、服务人民，人民群众可以直接看到、感受到。官员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直接体现党的形象，决定着为党的宗旨及奋斗目标的贯彻落实，直接影响民心向背。由此可见，“守公德”具有外显性和实践性，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联性直接而紧密。习近平指出，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14]。

第三，“严私德”是政德建设的基础目标。官员身份特殊，手中握有或大或小的行政权力。官员私德不修，不但会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且会给社会造成危害，“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15]。因此，“严私德”既是官员的立身之本，也是公正廉洁的从政之本，要



“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做人的过程看做是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看做是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16]。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严私德”的具体要求：处理好公与私、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严以修身，正心明道，克己奉公；严格约束日常行为，时刻保持人民公仆本色，管好“身边人”；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管好“家里人”，防止“枕边风”和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17]习近平强调“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只有在“小事小节”上严于律己，才能守住从政道德底线。

（三）导航仪、风向标与护身符：政德建设整体表征价值论

第一，政德建设促进党风政风转变，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传统的“民本思想”把国家安危、社稷兴衰看作是民心向背的结果，而民心向背又取决于仁政德治。习近平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政亡人息的历史教训：“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18]习近平认为政德建设不仅关乎官员自身发展，而且直接体现为党风政风转变，决定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并且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官员只有不断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始终保持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才能实现“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的目标。“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19]

第二，政德建设影响决定民德风尚，是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导航仪。“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这是对“官德”与“民德”关系的最好诠释。中国古代“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强调德礼高于刑政，特别注重官德对民德的教

化引领。《论语》所言为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表明官德对社会风气形成、对民众道德品行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习近平认为，要借鉴这些优秀传统官德思想，发挥政德的导航仪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20]他特别强调官员要言行一致，“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守法”^[21]。

第三，政德建设促进个人品德修养提升，是官员成长发展的护身符。强化政德建设不仅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需要，也是官员个人安身立命、成长发展的护身符。习近平指出：“道德问题是做人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许多腐败分子走上犯罪道路，大多是从操守不严、品行不端、道德败坏开始的。”^[22]可见，官员蜕化变质往往都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道德情操失守开始的。官员手中有权，如果个人道德修养不够，道德情操滑坡，就很难抵御各种诱惑，难以做到清正廉洁，最终必然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为此，习近平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23]不断加强政德建设，对官员的个人品行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就是要帮助官员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为原则的干部选拔中脱颖而出，继而以高尚品格、廉洁操守和过硬的本领去赢得民心、开创事业成就。

（四）宣传教育、道德自律与法制他律：政德建设整体导向方法论

政德建设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多管齐下，采用多种方式，综合施策。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24]这实际上指明了政德建设整体导向方法论。

第一，要注重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指导我们要把政德内涵、政德建设价值意义和目标要求等，通过多种宣教方式传递给官员。这是认知环节，是政德建设的前提基础。注重宣传思想工作是我党的传统法宝，要把“宣传思想工作提升到全局性战略高度”^[25]。除通过党校干校等教育培训学校举办系统的宣传教育外，习近平特别注重针对不同阶段政德建设的需求和安排，使用主题或专题教育的方式开展正面宣传和反面警示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活动。这些活动重点内容突出、问题意识明确，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好转和官员道德水平提升。

第二，要强调道德自律。道德的实现要依靠人的内心信念和自觉自为。习近平认为高尚的官德不会自发地产生、保持和提高，必须不断学习，在实践中主动修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26]提升道德自律性，不仅要为从政以德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且要继承党性修养的优良传统与方法。习近平指出：“虽然古代官德修养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政治文明具有继承性，如果扬弃其中的封建内容，有些东西至今仍然值得借鉴。”^[27]并且对“慎独”党性修养传统做了阐释发挥，强调新时代官员要做到“四慎”，注重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28]习近平还号召官员要向张思德、焦裕禄、麦贤德等历史和时代楷模学习。“这些人都是在普通的岗位上，但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发光的心，……希望大家一定要不断反省自己，以殷为鉴，远离危险，严守纪律和规矩，谨小慎微。”^[29]

第三，要完善法制他律。通过立法制规形式，将官德伦理要求上升为法律和制度规范，是古今中外的通行做法。习近平认为，必须借鉴这

些积极做法和宝贵经验，以法制的刚性运行规制官德。“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的同时，更应该强调与法制等强制手段的配合；在强调自律的同时，更应该强调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30]规制官员政德，既要发挥国家层面法律、法规与制度的作用，也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的作用；既要不断完善法制的内容体系，也要不断强化法制的执行监督力度。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织密人民群众监督之网，把官员政德交给人民群众去评判。总之，持续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切实提高各类法规制度的刚性执行力，是习近平开展政德建设工作的重要他律特色。

三、习近平政德建设观整体性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的整体性，既体现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体现为运用整体性思维方法对政德建设问题进行分析，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发展完善党的政德建设理论提供了方法论遵循

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借鉴古今中外成功经验，承继党的政德建设优良传统，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实际所创造的崭新成果，对党的政德建设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一方面，习近平政德建设观由政德内涵整体结构认识论、政德建设整体要求目标论、政德建设整体表征价值论、政德建设整体导向方法论，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组成，形成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习近平对四个组成部分的具体论述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始终运用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分析方法，形成了多个“三维一体”的具体表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要求。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政德建设的具体目标、内容、方法也必然要发生变化。但习近平政德建设观基本理论框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尤其是其使用的



整体性方法论，为学界进一步研究、丰富和完善党的政德建设理论，提供了根本方法论遵循。

(二) 为推动落实党的政德建设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

理论的真正价值在于实践，且抓住事物本质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和实效性。政德从根本上说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政德建设需要在深刻理解和把握政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综合采用道德建设的一般方式和政德建设的特殊方法。一是，政德属于道德范畴，直接思想宣传教育、间接传统文化熏陶和官员主动读书修行等一般道德自律方法适用于政德建设。二是，政德是为官当政者综合素质的体现，政德建设必须对官员提出高标准、严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因此，必须采用和强化国家法律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的他律约束方法。事实证明，党纪国法的使用和强化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提升以及道德品行先进性的保持效果显著。总之，习近平政德建设观既把握了政德的根本属性，也抓住了政德建设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目标要求，明确了宣传教育、道德自律和法制他律的总体方法路径，为推动党的政德建设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 为引领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标杆

作为公民中的先进群体，官员不仅要同普通公民一样，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积极主动提升个人品德修养，而且还要接受党和人民的更高、更严和特殊要求，做践行公民道德的典范和先进。习近平政德建设观对官员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和行为标杆，其中既包括道德建设的一般内容和目标要求，更包括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内容和目标要求。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公民道德与政治无涉等错误观点一度盛行。习近平强调“明大德”，要求加强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是对错误政德观

的纠正。新近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倡导共产主义道德，始终保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习近平政德建设观在公民道德要求和社会道德建设中的体现。

注释

- [1] 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 [2]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 [5] 【加】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1页。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 [7][13][27][30] 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求是》2004年第19期。
- [8][16][18]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第258页；第258页。
- [9][10][12][19][20][2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页；第15页；第168页；第15页；第164页；第419页。
- [11][14][17][28]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赵乐际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
- [15][21][23][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8页；第135页；第45页；第193页。
- [22] 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今日中国论坛》2009年第Z3期。
- [24] 习近平：《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
- [25] 余双好、汤楨子：《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内涵的历史演变》，《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 李玉婷